

1000所学校应该有1000种不同的培养模式,这才是中国大学的未来。每所高校都要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来论证应该招什么样的研究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

民办高校研究生培养——

困惑于行,而非困惑于形

■本报记者 温才妃

2011年10月,北京城市学院、西京学院、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河北传媒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共5所民办高校通过教育部审批,正式获得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

消息传出不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在博客中表示,民办高校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培养模式上形成特色,直接关系到其生存问题。

一年半时间过去,以应用型为主打的民办院校研究生培养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在运行中有哪些新探索,又遭遇了怎样的困惑,这些都点燃了人们的好奇心。

招生初年的困惑

“办了研究生教育,不是喜悦心情多了,而是白头发多了。”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感叹道。

在刘林看来,白发的背后寄托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回忆刚办研究生的第一年,由于一切从零出发,他时常要纠结于每一步尝试,担心新尝试会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有所伤害。

北京城市学院的专业硕士培养实行三导师制度,比起传统的专业硕士,不仅有学术导师、专业导师,还多了一位成长导师。前两者侧重专业指导,后者注重思想进步。这样的安排,便于学生毕业后更好地适合社会,百利而无一害。但作为校方想得却更加深远——三导师如何配合,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能否顺利合作,这在之前没有尝试,必须提前做好风险评估。

“我们琢磨的通常不是钱,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通过时间检验,彼此磨合才能验证的问题。”刘林最大的担心是,去实践就必须付出时间成本,即使钱可以白花,但学生两年的读研时间却耽搁不起。

同样的办学经验也困惑着西京学院研究生部主任蔡红专。如今的2012版培养方案经过多方论证修改,但运行近一年来仍不尽如人意。为了迎接2013级新生,蔡红专又拿出了2013版培养方案,其中既有体现“研究”特色的学科基础课,又有反映企业需要的项目相关课。例如,根据在阎良飞机城实习企业的需求,增设了反映航空特种电源内容的“现代电源变换技术”课程。

“课程建设是一个不断检验的过程。要时不时回头看看,哪些内容设计得不尽合理,哪些知识需要结合最新的实践作调整。”蔡红专说,事实上,从培养特点来看,公办院校的导师纵向课题较多,更多地是让学生在实验室完成项目,而民办院校则是师生同下企业,真真切切做市场需求的课题,学生从中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又提前了解了社会。

与北京城市学院、西京学院有所不同,吉林外国语学院早在2005年就采取嫁接的方式启动了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分别与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联合招收和培养学术型硕士。

尽管有一定的研究生培养经验,但该院院长秦和更希望,民办院校的专业硕士发挥自身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避免公办院校中培养专业硕士照搬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模式。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校园一角。

如何扬长避短,需要的不只是照搬,更要创新。

差异化探索的生力军

谈及专业硕士培养,不少人会问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的不同之处,甚至想知道民办院校有何过人之处,敢与公办院校一争高低。

“我不太强求在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上,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的差别。”刘林指出,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有着“两不同四同”——体制、机制固然不同,但在专业硕士的目标定位、质量要求、学术水平和思想品德上二者却是一致的。

刘林解释,民办院校研究生培养要通过灵活的体制、机制发挥应用型的特色,但同时也不能失去“研究”的本色,与大专式的人才培养等号。“如果一味强调‘四同’中公办、民办的差异,民办院校很可能重蹈本专科办学中过分强调公办与民办的差异,导致如今陷入‘低档次’认知的覆辙中。”

然而,相比较原则上“求同”,“存异”性质的探索也许更加急迫。

熊丙奇认为,1000所学校应该有1000种不同的培养模式,这才是中国大学的未来。每所高校都要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来论证应该招什么样的研究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

吉林外国语学院正在控制办学规模,努力办精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国际顶级翻译硕士培养单位——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探讨合作事宜,准备在研究生培养的第三学期,送专业硕士去该校学习,同时派相关教师去该校培训,引进海外教师讲学。

在课程设计上,开学第一个月,北京城市学

院便邀请了社会学权威专家为该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做入学导论讲座。之后是为期一两个月的认识实习。返校后,按照国家规定的研究生课程上课,课后再进行理论提高讲座。学生们可以同时进行其他的课程、实习、做课题三件事,临毕业前还有提高讲座。

“把整个研究生教育打碎了,将传统的标准模式变成了几段,理论、实践在螺旋上升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碰撞、检验、升华。这样才能真的把理论学进去,也能用得起来。”刘林说。

社会认可须内外并举

“无论民办高校还是公办高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都是培养质量的最好检验。”秦和表示,保证培养质量必须从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设计。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民办院校能在课程建设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真正意义上落实导师制,从而办出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那么,它被社会认可只是迟早的事情。

“关键是落实导师制,导师与学生是否经常见面、密切接触、交流沟通,有无把导师的学术经验通过共同的实践活动、科研活动传授给学生。”熊丙奇指出,我国高校的很多改革都是从国外取经回来,但是“每个环节我们是不是做好了,差别不是一丁点儿了。”

为了改变学生一次只与一类导师接触的局面,北京城市学院在课程中穿插了小沙龙,打破了平日三位导师互不碰头的局面,教师们共同解决学生的学业、实践、思想等问题,有时还借此良机共同讨论课题(课题组通常由学术导师、专业导师、学生三人组成)。

苦练内功的同时,刘林表示,建立政产学研用联盟也是增加社会认可的一大法宝。“联盟有

两大好处:一是大量的政府部门、行业部门、研究部门参与进来,把学校单主体的活动变成了多主体的共同活动。大家出力的同时,也会形成共识,增加认可;二是用人单位直接介入研究生培养,使得最现实的就业问题不用愁了。”

此外,他还鼓励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文化传播、社会服务等。比如,学校让研究生做的课题绝大部分都是实践型课题,而非闭门造车的课题。鼓励他们多去基层单位、区县,而非盯着国家部委,然后将发现的问题变成与地方合作的课题,在合作也是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增加行业认可度。

“不要把办学行为、学习行为局限于课堂、联盟内,而要进行开放式办学,把更多的教学融入全社会,从而获得社会的认知。”刘林说。

办学规模“独木难成林”

在一些人看来,只有5家民办院校享有研究生招生权,珍视特权也许比扩大规模更加重要。

刘林则认为,独木难成林,只有成为一片大森林,民办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才能蔚为大观。蔡红专也支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5家民办院校只是起到引导、示范的作用,未来将会有更多民办院校加入培养研究生的阵营。

“只要国家给民办高校这样一个机会,民办院校会比公办院校付出更多的珍惜和努力。”刘林说,“不在于给予一个学校很多办学点,而在于给它办学的机会。”

而如今,我国高校的办学模式却陷入了“经验论”的怪圈,从专科办起,一步步发展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就像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所说,在中国办高等教育,明明要盖一幢别墅,非得让你先盖一猪圈。在海外交流中,刘林看到,同样是民办院校,斯坦福大学第一个毕业生是博士,而我国民办院校第一个毕业生通常是专科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办高校教师指出,政府对民间力量的信任缺失还在延续。与此同时,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或国外高校联合培养硕士、博士,实质性的培养工作多摆在民办大学身上,合作办学不过是后两者寻租提供借口罢了。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民办院校研究生招生的规模小了,速度慢了,被传统思路下的经验论绊住了腿,这也许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题。

熊丙奇表示,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是基于国家授予文凭的思路——高校具有学位授予权,才能拥有相应的办学资质。像斯坦福大学完全实现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招博士生、硕士生可以实现自主招生,学位认可由社会中的专业机构说了算,完全没有“中国式的担忧”。“作为民办高校,想招博士生、硕士生,只要将来培养的博士、硕士得到社会认可就可以了。因此,首先应该打破民办院校研究生教育由政府评定资格的机制。”

有人提出放开考研权后易出现贩卖文凭的不正之风。熊丙奇提醒,不要忘记贩卖文凭是国家授予的文凭制度在为劣质的教育制度买单,打破这种制度才是中国教育最核心的改革,也是中国教育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

朋辈共勉助力“英仔”学业攀登

为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在学业辅导中的作用,仲英书院建立了名师辅导与朋辈互助相结合的学业辅导体系,邀请校内优秀专业教师对课程进行深入浅出的梳理讲解,同时以仲英书院院长团为基础,建立朋辈互助辅导体系,通过师生共同努力,助力“英仔”学业攀登。

朋辈互助辅导体系以四项品牌活动为核心,分别是“学业辅导巴士车”、“朋辈辅导沙龙”、“专业经验交流会”和“视频课堂”。“学业辅导巴士车”招募在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程方面成绩优异、方法科学的志愿者,志愿者向同学们提供即时的学习指导和帮助;“朋辈辅导沙龙”和“专业经验交流会”以讲座的形式向低年级学生提供学期课程指南、考前课程梳理、知识重点指引及专业经验介绍等服务;“视频课堂”将精品课程及辅导沙龙视频分享到书院主页,供更多的同学学习借鉴。

朋辈辅导体系开通不久,就为近千名低年级学生提供了讲座或一对一的学习指导,发放课程指南、复习小帮手数千份,受到了“英仔”们的好评。2012年底,朋辈辅导沙龙邀请钱学森11班王炳宇同学为自动化11级做复变函数复习指导,在随后的考试中,该级复变函数未通过率较之上届同期降低了50%。

在仲英人看来,着重学生人格养成,践行学生自我管理,致力学生综合能力提升,他们仍会在特色育人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打造富有责任感的谦谦君子——走进西安交大仲英书院

■本报通讯员 梁辉 刘昱含 本报记者 张行勇

在西安交通大学的东南角,坐落着一个郁郁葱葱的中心庭院——仲英书院。来自电信、能动、管理、软件等学院的16个专业3000多名“英仔”齐聚在这里,共同学习、生活、成长。

基于学生住宿社区形成的书院在西安交大已有8年之久。2005年,学校试点书院制,首设文治苑;2006年,成立彭康书院;2007年,成立文治书院、宗廉书院;2008年起,78个专业的学生按横向交融、纵向贯通的原则,划分到彭康、文治、宗廉、启德、仲英、励志、崇实、南洋共八大书院。书院已建设成为西安交大大学的温馨家园和第二课堂。

仲英书院秉承唐仲英先生“服务社会、奉献爱心、推己及人、薪火相传”的育人理念,致力于建设成为学生人格养成、自我教育的重要场所,并进一步树立了将仲英学子培养成为“富有责任感的谦谦君子”的使命。在理念、使命的驱动下,仲英书院将志愿活动与公益社团建设相结合,书院引导与学生自我管理相结合,朋辈帮扶与名师学业辅导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育人之路。

“英仔”的公益活动独树一帜

“如果做公益是为了从中获利,那么这种公益是心灵的祸根;如果做公益是由于义务驱使,那么这种公益只是简单的责任心;如果做公益是因为能够获得幸福,那么这种公益是善心。但如果做公益能够像早晨起来刷牙一样自

然,那么这种公益就达到了最高境界。这时候的公益,它就是生活。”大四“英仔”徐龙飞在日志中这样写道,他本人正是年轻的英仔爱心社创始成员之一。

2010年12月,在唐仲英基金会的支持下,英仔爱心社正式成立。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这个新生的社团完成了从注册社团到优秀社团的三级跳。“赴蓝田中小学手拉手献爱心”、“西北首家地铁志愿者服务队”、“陕博义务讲解”……一个个品牌活动的确立,见证着数百名“英仔”投身公益、服务社会的点点滴滴。

英仔爱心社只是仲英书院公益活动体系的一个缩影。仲英书院每年举办“感知父母恩”主题活动,鼓励学生和家沟通亲情。“春诵夏行”暑期实践游学活动,学生连续三年赴玉树、连续两年赴都江堰地震灾区开展志愿服务,孕育了一批优秀团队,并在当地建立了志愿服务基地,长期开展志愿活动。仲英书院还将志愿服务作为综合测评的重要部分,倡导学生每学期定时参加志愿活动,树立担当的意识。

“英仔”的文化标签是自理自砺

提起仲英书院的自主文化建设,学长团、《众思》杂志、品咖啡屋是重要的关键词。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组织都是同一个学生创立的,他就是核工程81班的严健铭。当他试探地向仲英书院提出关于文化建设的想法时,仲英书院相关负责人回复他:“这是你的项目,你想怎么

做就怎么做。”这句话让严健铭深受感动。

《众思》创刊于2009年,现已编印10期两万余册。该杂志本着“反映大学生目光投向,推动大学生勤思善思”的创刊理念,关注热点话题、热门事件,省察大学生生活,引领众多西安交大学生子完成了思想与精神的蜕变成熟。

品咖啡屋是仲英学生自主经营的饮品店,也是一个公益性的服务社团。成立三年来,“品咖啡”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营运作体系,在营造温馨休闲场所的同时,为广大英仔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实践平台。

老店员何一听说:“在‘品咖啡’的几年结交了一帮很棒的同事,不仅学会各种饮品工艺,还能去支持各个社团的志愿活动,感觉像家一般温馨。”如今,品咖啡屋已成为西安交大学生子自我管理、自主创业的典范,吸引了众多的兄弟院校前来参观调研。

仲英学长团是由大二、大三学生为主体的精英组织。学长团以“朋辈”的视角与新生开展交流,帮助新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困难,理解大学学习的内涵,适应大学学习的方法,促使其尽快完成高中至大学的角色转换。经过近4年的发展,学长团的核心品牌活动也日趋成熟,“暑假培训营——迎新——入学教育——新生面对面——户外素质拓展——专业讲座——通识训练项目——朋辈学业辅导”的活动体系已基本形成。四届学长团先后吸纳了280余名高年级优秀学生加入,开展活动200余次,累计服务、引导约万余人次的入校新生。

中国大学评论

侨民高考的超国民待遇从何而来

■冰启

原来不能在京报名高考,可变身美国公民之后,却不但能以侨民身份高考,还能享受加10分的待遇。考生张图的悲喜剧,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有舆论由此质疑侨民的“超国民待遇”。这当然可以说是分析这一问题的一个角度。然而,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取消侨民内地高考的“超国民待遇”,并不能带来内地考生的高考公平。

变身外国公民以侨民身份在内地高考,这可以说是少数家庭的无奈之举。如果内地高考没有户籍限制,他们用不着动这般脑筋吗?或者有人说,把这条路也堵死了,大家都一样,不能异地高考就统统不能,维持不公平现状,感觉也好一些。

在笔者看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对升学考试提出更严格的身份要求,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扩大高考公平的思路应该是,取消高考报名的身份限制,实现不设门槛的自由报考、自由申请入学。

其实,侨民之所以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与北京、上海等地考生有更高的高考录取率(尤其是一本录取率)一样,是由于高考报名、录取实行身份限制。对内地考生来说,就是户籍限制;对外籍考生来说,则是加入外籍年限、原有国籍限制。由于限制的范围不同,也就出现了“不公平”,但说到底,只要有限制,就有不公平。因此,推进公平,就在于取消限制。

眼下,教育部出来解释称,对加入外籍者报考我国大学有年限限制(要求入籍至少4年,且在这一国家学习生活两年),并表示这一限制也适合于以侨民身份在内地报名参加高考者。而根据教育部此前出台的规定,年限要求只适用于以留学生身份申请我国高校,对于侨民内地高考,其实并无年限要求,只要符合地方高考报名规定即可。而地方高考报名规定,只要求考生有侨民居留证——北京教育部门回应称加入外国国籍不能立即在京高考,指的是加入外国国籍要在内地高考,还得办理侨民居留证,所谓的不得立即,其实是办手续的事。有舆论认为,这一漏洞应该进一步堵住,这样一来,通过变身侨民在内地高考也就无法“制造”不公平了。

笔者相信,只要出台限制,这一“漏洞”确实可以堵住,可问题是,这些人变为外籍人士之后,他们以留学生身份报考内地大学,门槛要低很多——鉴于我国国内的国籍竞争力,到我国来攻读学位土生土长的外国学生并不多,而为了追求国际化指标,不少举办留学生教育的学校对留学生的资格审查并不严,而且入学门槛也低得离谱。举例来说,一个在我国高考中考上的一本都很难的学生,如果以留学生身份申请我国的大学,很有可能顺利进入北大、清华。这是教育部在2010年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规范招收留学生工作,防止跨国移民高考的原因所在。而且他们可自由报考其他任何国家的大学,真想继续接受国内高考的折磨吗?就是张图,他本来的意图并不是要变身侨民高考,而是在无意间发现有这么荒唐的空子——作为外国公民不能在北京报考,而变为外国公民却毫无阻碍。

只要有报名的身份限定,就难以落实平等的受教育权,对于我国公立大学的招生来说尤其如此。一个事实,我国内地的考生报考美国大学,对方并没有提出户籍要求,任何省市的中国内地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SAT考试,并用这一成绩去申请美国大学。换句话说,中国公民报考美国大学是纳入和美国公民一样的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录取的。那么,为何我国大学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呢?当然,有人会说,美国大学在招收国际生时也不是完全放宽,而是有一定比例限制的,并不是完全“自由”,这就是在偷换概念了,也有些蛮不讲理的。考生有平等的报考权是大学升学结果公平的重要方面,至于一所学校根据举办性质、办学目标,自主设置评价的指标、生源的比例结构,这属于学校自主权的范畴。通过行政规定的方式,规定某些人不得报考,这从根本上就取消了学生的报考资格,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大学不分户籍、国籍实行自由报考、申请,在我国并非不可能实现,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推进这样的改革。比如,全国重点大学就可以实行面向全国的统一招生,考生可以参加到一个统一测试,学校基于统一测试对学生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的学生自主申请、大学自主录取,这就不打破了地域限制吗?而考虑到地方(国别)的教育差异,高校在录取时,完全可以自主设置地方教育因素指标、家庭教育因素指标,进行适当的校正。这种考试、录取体系,真正把每个考生从身份限制中解放出来。

吊诡的是,我国在解决这类问题时,通常没有上述思路,而是制造不同身份者的对立。比如,解决异地高考,制造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对立;针对眼下出现的曲线异地高考,又制造移民(获得侨民身份者)和不能移民者的对立,结果是矛盾冲突加剧,有关部门趋势再强化身份限制,这实在是与推进公平背道而驰。这是必须摒弃的思路。从更深层次分析,设置报考的身份限制,某种程度上体现行政的权力,对教育进行行政治理。所以,要实现教育公平,就要制约行政权力,减少行政对教育的干预。